

1962年，北京有一個「七千人大會」，<sup>49</sup>批評大躍進及大煉鋼，毛澤東認為那些都是針對他的批評，是右派的行動、資產階級的反攻，並將之定性為「修正主義」。<sup>50</sup>當時周恩來也受到批評，毛澤東說周恩來像小腳，走起路來，跟右派只是五十步與一百步的分別；後來周恩來也差不多被劃成為右派。

毛澤東漸漸覺得很多農村的地方機關有問題，便派工作隊下去整頓。當劉少奇批評工作隊時，他自己馬上變成了「問題」，成為學生整肅的對象。當時中國陷入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，而當覺得廣大的年青人不受控制時，便推出「上山下鄉」運動，將成千上萬的學生送去農村，把農村說成是他們的廣闊天地。還有張鐵生事件，<sup>51</sup>考試交白卷的學生，還可以當幹部。

為什麼要年青人上山下鄉呢？實在的原因是這群年青人沒有工作機會，要他們下鄉，不是真的要他們建設中國，到那個所謂的「新天地」學習，試問他們跟農民可以學些什麼呢？這些都只是團體組織與策略安排，只是當時毛澤東有很高的威望，大家都信服他，按照他的說話去做，結果為中國社會帶來了很多後遺症。<sup>52</sup>

## 香港與內地的關係，1948–1957

1948年，廖承志擔任新華通訊社的總社長；那時中共中央設在河北西柏坡，<sup>53</sup>並已經出現全國取得勝利的局面。五一前夕，廖承志發了一個非常幽默的電報到中央，說道：「五一臨近，我們有什麼屁要放呢？」<sup>54</sup>這一封電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，當時毛澤東正準備辦新政協，他便修改了新政協所採用的口號，將「共產黨萬歲」改為「全國人民團結萬歲」。這些團結的口號也被發佈到香港，而且產生了作用，動員了大家前往北京，參加新政協、成立新中國。那時身在香港的郭沫若、<sup>55</sup>李濟深、蔡廷鍇等不同背景的人士都一致擁護五一決議，<sup>56</sup>

前往北京。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，李濟深、張瀾、<sup>57</sup>何香凝<sup>58</sup>等人，有些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，有些擔任副總理，或成為各個部門的領導，當時香港人在國務院內佔有相當大的比例。

廖承志是廖仲愷的兒子。廖仲愷<sup>59</sup>原籍惠州，留學日本，1892年開始跟隨孫中山先生，負責籌款工作，他曾任黃埔軍校的國民黨代表，以及國民黨財務部部長。廖承志的母親何香凝，是來自香港的大家族，<sup>60</sup>廖承志在日本出生，他的日本話說得很純正，而中學則是在廣州嶺南大學附中唸的。廖承志的姊夫李少石，<sup>61</sup>在重慶時被殺害；<sup>62</sup>廖承志也曾經有數次幾乎被槍斃的危險。蔣介石也曾想將他置於死地，但蔣介石還是顧及他與廖仲愷及何香凝的關係而沒有執行，但時移世易，後來想要殺掉廖承志的，竟是共產黨的張國燾。<sup>63</sup>

廖承志的幽默電報，顯示他在當時是受重用的，他在中日關係上曾經作出了很多貢獻，代表中國與日本談判協議；他所主持的華僑及港澳工作也有很大的成就，但過後卻被置於遠離權力核心的地方。雖然他所得到的待遇並不公道，但廖承志卻不在乎！

1949年的香港，中華總商會掛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，更組織一些人回去國內。一直以來，香港都是進行地下工作的地方，而廣東相對地主張開放，有不少國外人士是經由香港返回國內的。當時出任廣東省副省長的鄧文釗，<sup>64</sup>原來是香港華比銀行的經理，是一位富商。香港荔枝角三光布廠的經理陳君冷，<sup>65</sup>也結束生意返回內地，成立「華僑投資公司」。很多熱心的、愛國的都回去，包括居港的印尼僑領黃潔、<sup>66</sup>泰國的蟻美厚、<sup>67</sup>菲律賓的黃長水<sup>68</sup>等。

在1950至1957年之間，我們在廣州興辦「華僑投資公司」，建築華僑大廈，設立華僑新村，籌辦華僑小學、暨南大學。華僑投資公司的資本都是華僑從外面帶回來的，當時還聲明投資的資金可以獲得年利率八厘的利息。但後來這些都成為「黑樣板」，全部都被沒收了。

南北行的陳祖沛，<sup>69</sup>是香港的有名商人，在解放初期他的生意是賺錢的，但他把自己的大成行，以及在天津、武漢及香港各地的公司結束，將資產帶回廣州，參加建設華僑大廈，辦廣東省工商聯，並出任主席。後來在「三反五反」<sup>70</sup>運動時，他被迫跳樓自殺，雖然沒有死，但卻斷了腳。

新中國成立後，香港的英國人也明白到需要改變，於是有貝納祺（Brook Bernacchi）的「香港革新會」<sup>71</sup>的出現。另外，那個時候的「華人革新會」<sup>72</sup>（簡稱「華革會」）也都走在前面，非常強調民主；該會的主要領導成員有陳君葆、<sup>73</sup>莫應滙、<sup>74</sup>蔡渭衡<sup>75</sup>及黃祖芬。<sup>76</sup>莫應滙是香港大律師，蔡渭衡後來成為華革會的副秘書長，黃祖芬原是中華中學的校長，是梁愛詩的舅父。

1951年底，東頭村木屋區大火<sup>77</sup>之後，內地派人來香港發放大米。然而隊伍在1952年3月1日到達羅湖時，港英政府拒絕他們入境，於是香港有示威抗議行動，參加的有數十個團體，包括華革會和中華總商會。英國人卻利用這個事故，將莫應滙遞解出境，這被稱為「三一事件」。<sup>78</sup>

1950年代初，中國抗美援朝，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，經香港轉運的支援物資也因而停頓下來；這裏就要談到霍英東先生了。霍先生對我們說得十分清楚，該段期間他負責將物資運回國內，他只知道中國需要相關物資，但卻遭人家禁運，他認為那是他應該幹的事，當時他並沒有什麼要幫助國家的覺悟，後來才知道他的生意是有那麼重要的作用。<sup>79</sup>

其時很多鐵料、汽油用品等物資，都是經香港轉運到內地的。從香港偷運物資進入內地，是華僑投資公司的工作。根據一些朋友說，當時戰場上很需要的青黴素，<sup>80</sup>是由一位張姓人士購買營辦，再由霍英東負責運輸返回內地。

## 香港的角色

對中國來說，香港有什麼作用呢？我一直都想着這個問題。在廣東，地方社會有機會接觸許多外來的思想，但也自然容易受到外面的衝擊。西方社會有許多先進的事物，他們不但有機器，還有許多思慮和經驗。500年前歐洲的傳教士聖方濟各(St. Francis Xavier)已經到達台山外海的上川島，之後島上還蓋了教堂。<sup>81</sup>數十年後，意大利的幾何、天文學及有關大自然的知識，便是經過廣東而傳到北京。<sup>82</sup>蘇格蘭的馬禮遜<sup>83</sup>前來中國傳教，他的傳教工作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；他本人沒有到過香港，最後在廣州去世，葬於澳門。廣東的洪秀全<sup>84</sup>在咸豐元年(1851年)建立太平天國，以外國為學習對象，他受到西方天主教的影響，開始時，組織內強調天父天兄的平等關係，但最後還是建立了一個封建王朝。太平天國失敗後，洪秀全更把所有的「兄弟」斬殺，一個不留。

我們華南有很多先行者，他們接受西方的教育，所以南方地區受西方的影響也比較大。在這個西方影響中國的過程中，香港產生了很大的作用，清廷派往美國的留學生，就是通過香港前往美國，香港的周壽臣<sup>85</sup>便是其中的一個留美學生。在香港長大的何東，<sup>86</sup>是政商名人，父親是荷蘭的猶太人，母親是華人，他喜歡穿長衫，以華人自居。孫中山在香山(今廣東中山)出生，是香港西醫書院的學生；香港西醫書院是香港大學的前身。四大寇<sup>87</sup>也是在香港活動；興中會、<sup>88</sup>同盟會<sup>89</sup>等組織，都是從香港開始革命活動。孫中山在香港組織革命活動、組織會黨、安排成員返回內地進行革命。到湖北新軍起義，影響蔓延起來，孫中山便從美國太平洋回來。為何香港會得風氣之先呢？而革命黨人又為何敢於去與滿清對抗呢？那是因為香港提供了一個地方，讓他們避開滿清政府的直接殺戮。另一方面，香港是一個輸

入西方理念文化、傳播消息的地方，也是一個讓我們瞭解外面世界的運作、掌握世界大勢的地方，香港擴闊我們的視野，令我們反思很多問題。

可以說，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，香港人的想法，也與很多中國人不一樣。相對北方來說，歷史上，中國南方有比較多關於新思潮的討論與行動，「國際共產」思潮在廣東已經有很長久的發展歷史，孫中山推行「三大政策」，<sup>90</sup>興辦黃埔軍校，<sup>91</sup>後來周恩來便是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的主任。在廣東，廖仲愷負責民國的財務，<sup>92</sup>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。孫中山及廖仲愷都是香港皇仁書院<sup>93</sup>的學生，民國初期的第一任外交部長王寵惠，<sup>94</sup>也是香港人。香港很早便是一個接觸西方思想、西方革命思潮的地方，所以香港能夠出了那麼多對中國有影響力的人。

我們要建立新中國，進行現代化，但如何進行，是需要學習的。西方的社會與文化，是我們學習的一個方向，而香港也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。雖然香港地方不算大，但英國人將香港，尤其是市政衛生，弄得井井有條。香港的制度是如何建立的呢？在香港，我們有機會瞭解西方社會所出現的問題，以及其應對的策略與方式等。在當前香港的學生運動中，<sup>95</sup>中國採取一個不妥協不流血的政策；從中可以學習到許多東西，有正面的，也可以是反面的。

中國從一個農耕社會裏走出來，從一個專制、極權的制度中走出來；在體制上，中國是封建的、落後的、閉塞的。解放前，大家一直都認為：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太多，而是資本主義太少，我們要改變中國的舊制度，要將中國脫胎換骨。毛澤東曾經說過：「我們要搞民主，我們要搞新民主主義社會。」<sup>96</sup>但這個改變，卻成為一個長期的、很痛苦的過程。這百多年來，政局與社會制度反反覆覆的，老百姓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之下，更要在長時間的痛苦中探索。



婚禮家庭合照，包括何銘思及陳用心雙方家庭成員，1951年。



何銘思與陳用心結婚照，1951年。